



■ 椒言辣评

考试成绩应该公开排名?

日前,一项对2001名受访者进行的调查显示,74.4%的受访者身边仍有小学和初中公开学生成绩排名,57.7%的受访者认为公开排名会让考生觉得分数和名次最重要;47.5%的受访者希望不排名,仅将成绩告知学生本人和家长;60.2%的受访者希望老师树立坚决不排名意识,做好考试后续工作。
(3月6日《中国青年报》)

@ 读者刘剑飞 首先,教育部有明文规定,要求义务教育阶段学校考试成绩不进行公开排名,不以分数作为评价学生的唯一标准。既然教育部有此要求,各地当严格执行,认真落实。其次,公开排名不仅容易造成教育歧视,而且严重挫伤学生的自尊心,很容易导致学生产生厌学情绪。事实上,不公开排名并不是不排名,只是不要将排名结果进行公开,这无疑是一种教育智慧和对学生保护。

@ 读者乔英杰 作为一名高中一年级学生家长,笔者觉得公开学生成绩与排名很有必要。虽然从心理上来说,公开成绩与排名可能会让孩子产生诸多不适,但这种所谓负面作用不是决定性的,如果运用得当,还会激励孩子认清不足,迎头赶上,缩小差距。所以,凡事不可太绝对,凡事也不可太教条。况且,孩子们可能根本没有想象中的那么脆弱。

@ 媒体人简正 公开成绩排名既伤自尊,也伤面子,特别是对一些性格内向的孩子来说,打击是巨大的。笔者当年所在的高中是一所省重点高中,高手如云,无论大小考试,老师都会从第一名到最后一名当众宣读排名成绩,而且还会纵向对比,例如谁较上次考试进步了多少名,谁又落后了多少名,笔者每次都坐针毡,心里承受极大的煎熬。都说高中是最美好的时光,而笔者每每回忆起当年,更多的是黯淡和不快乐,只因那一张张成绩单表。

@ 浏阳市沿溪镇沿溪完小李阳春 公开成绩排名有利有弊,它能激励一部分人奋发向上,也容易对一部分学生造成心理阴影。从扬长避短的角度出发,本人认为考试成绩与排名最好做到有限公开:考试整体情况如最高最低分数、各分数段人数等等可以广而告之,方便学生在参照中找准位置,认清目标,至于涉及个人隐私的成绩和排名应私发给个人,不应公开。

@ 读者马全和 笔者赞成公开成绩排名。一方面,没有压力就没有动力,不公开成绩排名,学生学习则会如一潭死水,我们的教育如何赶超国际水平呢?只有公开成绩排名,学生才能互相竞争,形成百舸争流的积极氛围;另一方面,在有些学校,学生的成绩与奖学金乃至座位排序直接相关,公开成绩排名也能杜绝此类现象,压缩腐败空间。

@ 邵阳市洞口县第七中学谢建中 笔者建议,对于学生成绩的优劣应该从“知识、能力、品格、特长”等多方面进行综合评价,有些学生文化成绩一塌糊涂,但办事能力和交际能力很强,这样的学生将来走上社会可能会很有出息;有些学生在体育、音乐和美术方面有特长,学校就要想方设法从这些方面加以培养和提高,给他们施展才华的机会,而不是用冷冰冰的分数对学生盖棺定论。

“给学生减负”为何牵动人心

□ 石羚

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中,一件小事引来不少家长关注,那就是“着力解决中小学生学习负担重”的表述。而去年年底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更将这一问题列为非补不可的“民生短板”。中小学生的书包,为何成了如此“高层级”的议题?

书山题海、死记硬背、拖堂加课的教育方式饱受诟病,事实上,减负的要求由来已久。早在1955年,教育部就下发过《关于减轻中小学生学习过重负担的指示》;1990年的《学校卫生工作条例》还规定小学生在校学习时间不超过6小时。近年来,国家也多次出台“减负令”,其规格之高,措施之细,让人印象深刻。

刚刚过去的寒假,“影子教育”成了一个热词,说的是校外培训机构的不断扩张。不仅是寒假,孩子们其他的很多课余时间也交给了补习机构,“负担越减越重,睡眠越来越少”的情况普遍存在。一些地方甚至出现了“公立学校、补习机构沆瀣一气”“不报课外班就听不到完整知识点”的乱象,扰乱了正常的教学秩序。当然,这也增加了家庭开支,有家长甚至发出“月薪3万,竟撑不起孩子一个寒假”的感慨。

在今年两会“部长通道”上,教育部部长陈宝生接受采访时,回应的第一个问题就是与减负有关的“三点半”现象。孩子三点半放学,本是为了减负,不过家长要五点半六点半才下班,当中两个多小时成了“空窗期”,给孩子的福利成了家庭的压力。一篇名为《请不要给我的孩子减负》的网文提出,凡此种种的减负方式,反而把孩子的教育交给了社会,让家长陷入课外培训的“军备竞赛”。家长既希望孩子快乐成长,又期盼孩子“题名金榜”;既焦虑在考试中能否出人头地,又关切是否有一技之长。这也从另一个角度折射减负的困境:减负要真减下去,可能还需要更加全面、综合、系统的制度安排。

应该说,目前,考试仍然是教育的指挥棒,指挥棒指向哪里,整个社会的资源调度就会朝向哪里。要减负,说到底,要从源头上建立多元评价体系,杜绝减课时不减考试的表面文章;要“调结构”,着眼综合素质、调整课程大纲,也要“提质量”,减少机械重复,激发学生兴趣;要疏通机制的阻碍,也要堵住课外培训恶性竞争的漏洞……总之,教育应着眼于人的全面发展,切实把减负这一手段当做根本目的。

从这个角度看,也就理解了为什么政府工作报告关注给中小学生减负。可以说,减的是负,提出的却是一个教育改革的命题。出台文件、落实措施都相对容易,但在现实土壤与利益格局中,谋定全局的策略,摆正各方的角色,却有大量工作需要持续不断地推进。给孩子们“减负”,应该是一致的认识;素质教育,更是共同的期望。将招录制度的改革做实,将教育资源均衡化做实,才能真正让孩子们童年丰富多彩。

有委员说,“减负是一个系统工程”。的确,教育中的各方都不能置身事外。家长的心态要更平和,学校的方法要更优化,辅导机构的组织应更有序,特别是教育部门要有大作为。只有各方相互理解共同给力,才能撑起孩子更美好的未来。

“重洋轻本土”的人才标准是学历歧视

□ 易名

做出影响世界成果的“土鳖”(本土博士),得到的特别待遇是“破格提拔研究员”;而作为人才引进的“海归”,也许什么都还没做,就已经当上了“研究员”。

全国人大代表、中科院上海分院院长王建宇在两会上讲到了这个令人哭笑不得的对比。他为本土培养的研究人员抱不平——引进人才当然重要,“但千万别忘了扎根本土的人才”。

以“出身”论英雄,的确已经成了国内高校和科研机构吸纳人才的“标准动作”。一些高校为“海归”博士开出高价码,不光在职称评定时一路开绿灯,而且在科研资金、住房待遇等方面明显倾斜;甚至有些科研机构的优势学科用人非“海归”不要,“土鳖”遭遇各种学历歧视。

引进有海外学术背景的人才,是因为发达国家科研基础实力雄厚,“海归”有机会掌握先进的研究方法,思维和理念与国际前沿无缝接轨。过去,在我国科研实力整体落后的客观国情下,引进“海归”青年学者是实现科研水平“弯道超车”的重要手段。

如果说,从前国内科研机构青睐“海归”,是基于客观认知学术水平的理性。现如今,我国的科研综合实力与发达国家的差距明显缩小,我们的人才观需要确立一种新的理性。

一些科研机构在宣扬引进人才的成果时,动辄把“海归”比例当成重点指标,这就是一种脱离客观现实的非理性。人才评价,归根结底是对人的评价,而不是对任何附加头衔的评价。衡量科研人员学术水平的最重要指标是科研成果。

通常来说,“海归”人才站在学术前沿,外语能力强等优势,使其更容易取得国际认可的科研成果。对于这样的人才,在引进时获得更好待遇,当然无可厚非。但是,如果不看真本事、真成绩,仅仅因为“海归”身份就高看一眼,那就是本末倒置。

建立科学合理的学术评价体系,最基本的就是公平评价的环境。以学术出身粗放地评价人才,对扎根本土的人才是不公正的,进而会影响他们开展研究的积极性,人为地制造“强者愈强、弱者愈弱”的局面。这种做法,无疑是阻碍科研事业健康发展的体制机制弊端。

在国家不断加大科研投入、科研实力明显上升的今天,我国科研评价体系需要不断加强自信。这种自信,首先需要正视自己真实水平,祛除学术评价的妄自尊大心态,让本土研究人员得到应有的尊重。

大学赏花需要成熟“攻略”



刚刚过去的春日周末位于广州市的华南农业大学紫荆花盛开,吸引了数万游客前往观赏。不巧的是,这也是毕业生拍毕业照的日子。因此,校园里人山人海,校园外车水马龙。

近年来,大学赏花风生水起,“没有围墙的大学”在花季呈现在了市民面前,不能不说是一种进步。既然如此,大学赏花就需要一份越来越成熟的“攻略”:大学能够有计划地接受游客入校,而赴校游客也能熟谙大学校园内外秩序并心存一份公共敬意,在相互磨合中共同促进大学与市民在更多方面的融合。

燕衣

禁止炒作“状元”需国家出手

□ 刘义富

元”,才能为学校挣得社会荣誉,吸引更多优质生源。

四是一些舆论媒体的推波助澜。为扩大影响力,夺得更多市场资源,一些媒体忽略舆论应有的教育引领价值,刻意迎合公众需求,大肆炒作“状元”,博得眼球,引发社会关注与热议。

无论何种动机的“状元”炒作,都无法逃脱名利缠绕的怪圈,这种缠绕让基础教育生态始终无法真正好起来,并在很大程度上持续强化社会对教育的不当认知,让公众对教育的理解囿于考试分数的粗浅层次,抵消素质教育、划片招生、指标到校、自主招生等教育教学改革效果。

自去年开始,中高考成绩排名以及媒体炒作“状元”的现象有所降温,这得益于教育主管部门自上而下的严格要求。即便如此,

还是有学校出于种种目的,开展升学率以及“状元”宣传。

值得警醒的是,随着新媒体的出现,一些“状元”被拉入新媒体的商业运营模式,通过听直播获取备考经验等方式获取利益,以更商业化的方式推动消费“状元经济”。

要彻底禁止“状元”炒作,就必须出台国家层面的监管“硬杠杠”,不仅要有行政部门的禁令,还要有明确有效的责任追究机制与处罚措施;不仅要有行政法规的约束,还要修改完善相关的法律法规,把禁止宣传炒作“状元”上升为国家层面的要求,违反规定的学校、媒体以及新媒体机构不仅要受到行政处罚,而且要承担民事甚至刑事责任,惟如此,才能从根本上消除“状元”炒作现象,也才能最大限度地降低“状元”热带给基础教育的负面影响。